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远方出版社

邓友梅『侃山』，真诚恳挚，朴实无华。六十多年的酸甜苦辣，所感所闻，尽在这情深意浓、娓娓动听的『侃』中……

■ 邓友梅 / 著

无事忙侃山

WU SHI MANG KAN SHAN WU SHI MANG KAN SHAN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44.628
372=3

远方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 邓友梅 / 著

无事

忙侃山

Ray 4/1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事忙侃山/邓友梅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2. 1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ISBN 7-80595-730-4

I. 无… II. 邓…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5380 号

无 事 忙 侃 山

作 者 邓友梅

责任编辑 张 涛 胡丽娟

封面设计 月 雅 晓 乔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8 千

印 张 1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730-4/I·291

定 价 14.00 元

目 录

无 事 忙 侃 山

我的写作生活	(1)
穿过大街走小巷	(16)
闲话“陶然亭”	(20)
闲话鼻烟壶	(25)
嚼槟榔与闻鼻烟	(30)
说茶	(35)
鬼子投降了	(41)
新四军文工团和陈家白庄	(46)
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	(51)
开国之日在南京	(63)
我见过的老舍先生	(69)
难忘丁玲读书	(74)

无
事
忙
侃
山

阿姐志鹃	(79)
又到扶桑	(116)
情寄马六甲	(140)
无事忙	(146)
保管灵	(148)
高五姑	(151)
大观楼的曲艺	(154)
大观楼的文明戏	(157)
最早看的两次电影	(159)
通俗不等于庸俗	(162)
宫南宫北娘娘宫	(166)
空竹和彩灯	(170)
华北戏院	(174)
曲艺杂谈	(177)
讲“混混”的《津沽英雄谱》	(180)
听说书	(183)
关于“样板戏”	(187)
潇洒嚼一回	(191)
台湾的“喝”	(195)
拥护禁食槟榔	(198)
烟壶的黄金时代	(202)
内画大师王习三	(206)
明天就是“九九重阳”	(210)

无
事
忙
侃
山

怀念天津的小吃·····	(213)
天津租界的穷洋人·····	(217)
中国地的年景·····	(221)
再说年景·····	(224)
四合院和里弄房·····	(227)
当 铺·····	(230)
再谈当铺·····	(233)
京津当铺不相同·····	(237)
60 年前入黄门 ·····	(241)
可悲的小学时代·····	(246)
痛别萧铜·····	(249)
忆树理老师·····	(256)
记曹禺大师·····	(259)
也谈财神·····	(262)
一篇难写的文章·····	(265)
香港的京剧观众·····	(268)
天津也出剧人·····	(271)
“天华景”的机关布景戏·····	(274)
高渤海与天津“稽古社”·····	(277)
“绝”戏三记·····	(280)
“不容易”和“没牙的唱法”·····	(283)

无事忙侃山

“王大娘”凑热闹·····	(285)
戏说散文·····	(289)
老舍发表意见·····	(293)
“50 周年”中的小事 ·····	(296)
胡絮清师母派的好活儿·····	(299)
进入古稀·····	(304)
话说胡子·····	(307)
再说胡子·····	(310)

我的写作生活

我只读过 4 年小学,我读小说是从看张恨水、刘云若的言情小说和《十二金钱镖》等武侠小说开始的。我 11 岁从出生地天津回到故乡山东。故乡是抗日根据地,在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教育下,我 12 岁就参军当了交通员。只干了一年就赶上精兵简政,部队发给我家 40 斤小米几丈粗布,令我复员。并要我尽快离开老家,怕鬼子扫荡抓住我。既是为了我

的安全，也是怕我经不住考验。我就到天津投亲，从此流浪在天津街头。碰上街头有打着旗招工的。不讲条件也不要铺保，我见机会难得，求着人家把我收下，谁知拉上船就被送到了日本。干了一年多。美国飞机把日本工厂炸毁了。没活可干，日本人又把我们送回中国，打算叫我们再在他们在中国的矿山上劳动。中国人回到中国后就有办法了，我在几个大工人带领下就逃出工厂参加了新四军。

我在天津流浪时，街头有出租小说的。租一本小说一天才收几分钱。我打零工吃饭，别的娱乐玩不起，只有租书还租得起，就读起了小说。为消遣读书，又没人指导，惟一的选择就是好看。《薛仁贵征东》、《江湖奇侠传》、《红杏出墙记》、《旧巷斜阳》，碰上什么看什么。看着好看就看完，不好看第二天换一本。就这样开始养成了读书报的习惯。

在日本当牛马，见不到中文书报。回国参加新四军后，一开始在连部当通讯员，见到书报真是如饥似渴。我当通讯员，营长见我爱读书挺高兴，不光表扬我，到团里开会时还专门上宣传科替我找书，日本投降后部队要把一些没机会上学的小同志送进学校去补习文化，营长抢先要了个名额，把我送进了根据地一所中学脱产学习。可我当时当兵当野了，穿一身军装跟人家老百姓孩子一块坐在课堂里念书，怎么也坐不稳当。碰巧军文工团排戏缺少个演小孩的演员，找了几个孩子面试，人们见我会说国语（那时还不叫普通话），脸皮又厚，而且是部队送来代培的，没有参军籍问题，一张调令我就成了文工团员。

小孩的戏不多，没戏演时我管小道具、点汽灯，最多的是爬在幕后小声念剧本给台上提词。这样人家演一个戏我

等于念了一个剧本，念多了无意中受到了编故事、写对话的熏陶。那时演的戏多半是小歌剧和秧歌戏，于是也学会合辙押韵。解放战争打起来后，文工团开到前线做火线鼓动工作，不能正式搭台演戏了，只能在战场作即兴演出。行军时部队走路我们就站在路边唱歌数快板。看到什么要现编现演。我们新四军文工团许多演员来自上海，成本大套的演戏是专家，可没干过火线鼓动，不会扭秧歌，更不会编快板，我就靠我提词学来的本事试着干。看见从路上走过来的是炊事班，我就打着板儿说：“炊事员真能干，又做菜来又做饭。同志们吃得香又香，又打鬼子又缴枪。”团长一看我比上海来的大演员还编得流利，以后除了点汽灯，还叫我参加编写小节目。有回我数快板叫前线报纸编辑听见了。他说：“喂，你编的这段还不错嘛。把它写下来交给我好吧。”我说：“我会数，叫我写有的字我还写不出来。我说你记行吗？”这样我说他用文字记，他拿回去过两天在报纸上印出来了。那位编辑又拿着1斤花生、5个柿子来找我说：“这是你那篇快板的稿费。不过这稿子是我替你写成文字的，还给你作了挺大修改。得咱们俩一块吃！”这就是发表的处女作和拿到的第一笔稿费。

解放后，我从部队转业，调到北京文联，在赵树理手下工作。1951年我参加赴朝鲜慰问团的创作组，写了一篇小说，赵树理看了马上拿在《说说唱唱》发表了。不久到了“八一”建军节，赵树理让我再写一篇小说作配合，我赶写出一篇又发表了。从此我就往写小说这行奔了。开头写一篇发一篇，我觉得当作家并不难。只要有生活，再从理论上补充点知识就能闯出路来。于是我就加班猛补文学理论。这才

知道写小说首先要注意主题的思想性,考虑作品的教育性;要塑造典型人物,要体现时代精神……我这才知道写小说还这么多说道,于是就按这些规定去写。说来令人伤心,从此写的东西竟写一篇被退一篇,一年多的时间竟一篇小说也没发出去。我这才发现写小说并不那么容易,以前乐观得早了点。

领导人赵树理、王亚平等认为我虽有文学细胞,但文化根底太差。恰好中国作协开办的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第二期招生,便决定派我去学习。

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还是丁玲,这所就是她创办的。丁玲同志访问苏联,蒙斯大林接见,斯大林问她:“中国有没有培养作家的机关学校?”丁玲说没有。斯大林说:“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高尔基文学院吧。”丁玲参观后,才知道这是专门为有生活积累但缺乏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们创办的学校。她觉得中国也有一批这样的作者需要补课。回来以后向中央作了汇报。最后是毛泽东主席点头,建立了中央文学研究所。专收参加革命较早、写过不错的文学作品,但没受过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第一期学员有陈登科、马烽、胡正、李若冰等。陈登科最为典型,这时他已发表了《活人塘》,这是可称作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但这篇《活人塘》是被汪曾祺在整理退稿时偶然发现的。他看了觉得有意思,就拿给赵树理看,老赵看了认为基础很好,就亲自动手修改,还替他重写了个开头。陈登科的小说虽然写得不错,可他那笔字比天书还难认。不光写得草,还自己创造字。稿子里有好几处的“马”字下边都没有四点。汪曾祺看着那部稿子发愁地吸了半盒烟都猜不出念什么,念“马”吧,

没有四个点，前后句子也连接不上，不念“马”应该念什么呢？恰好康濯从他身边经过。他叫康濯猜。康濯看了说：“我猜念‘卧’，马看不见腿不是卧下了吗？”。写信问陈登科，他说他创造的这个字就是“卧”。当时文学研究（讲习）所收的就是这类人。

进了文学讲习所后，我认真读书，一天最少要读十几个小时的书。所里规定如果不上课，每天阅读书籍不低于5万字，我每天都读7万以上。所里没有专职老师，学哪一门就请哪一门专家来讲。如讲屈原，主要就请游国恩讲，学莎士比亚就请曹禺讲。听曹禺先生讲课比看他的戏还有意思，非常精彩。但听完回去自己写起作品来，他讲的学问却一点也用不上。当时我和曹禺先生住同院，吃饭在一个食堂。有次回家，在吃早饭时我和他坐在一起。他问我大家对他讲课有什么反映？我说：“你讲课大家很爱听，但真的写起来，为什么都用不上？”曹禺先生说：“小邓，我写了一辈子，一讲你们都用上了，我吃什么呀？”我说：“您的秘诀不告诉别人，总可以传授给我吧！”曹禺笑笑说：“说真的，作家的真本事都用在写上，真要讲，一个钟头就说完了，你们规定一课讲两个半小时，只好一多半时间讲废话！”我又问：“那一个小时的要点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小时也没有，也就有15分钟。其实15分钟都用不上，就一句话：你想学着写剧本，就背上三个剧本，背得滚瓜烂熟，背熟了再写，就跟原来不一样了，别的没窍门。”我后来才明白他说的是实话，学写作其实跟学骑自行车一样，看人家怎么骑你就怎么骑，骑不好就挨摔。摔着摔着就会了。想学写小说，就读好小说，读通了再写，就跟不读的时候不一样。

文学作品有没有客观标准？当然有。有历史和社会评价问题。我们提倡读名著，读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但作为一般的读者，有权利选择自己较为喜欢并与自己阅读水平接近的书籍来读。个人喜欢看的书读来就印象深刻。以我个人的体会来说，也正是自己曾喜欢读的书籍，对自己以后的文学创作起到很大作用。

在文学讲习所学习外国文学，必须读的书有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是郭沫若先生翻译的。作家是名人，翻译家也是名人，但我读不进去，一看就打盹，什么也记不住。如果只有背好《浮士德》才能写诗的话，我这一辈子也当不了诗人。学习歌德的阶段，我桌上放着《浮士德》，抽屉里放一本爱看的武侠小说，没人时打开抽屉看武侠小说；一看所长丁玲走来了，就收起抽屉装着读《浮士德》。

所长召开座谈会，了解学员读书情况，有人已给我汇报，说邓友梅从不认真看课程内的书，却偷着看武侠小说。丁玲很开通，她说，没关系，有的作品知道一下就行了，有的作品爱读就多读两遍。对于作家来说，只有读得进去的作品才会起作用。真正起作用的作品是能接受的作品。经过一些年的创作实践，我的体会是：读书像听收音机，每个人都有他接受的频道，不是这个频道就不能接受。读得进去的作品写作时有意无意会去模仿它。没有一个人开始写作不是模仿的，但人的学习水平接受水平是会不断提高。后来我对托尔斯泰的著作、巴尔扎克的著作也读了不少。

文学理论有没有用？有用。只有写作写到了一定的程度，回视自己的创作的时候，再用文学理论去衡量，再作思

考,才起作用。

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我的导师是张天翼同志。我问他,作家怎么养成观察生活、捕捉题材、捕捉形象的技能。他说,记日记。你每天从宿舍到课堂(当时在鼓楼,宿舍与课堂隔着一条马路),一个月要走几十趟。你给自己提个要求:每天找出一件新景象,过去没注意到的地方重新注意,每天记一条,看看能记下多少条,这样能逼着你自己去发现过去看不见的东西。另外,在记的时候,想说什么偏不那么说,而设法让人看了得出你的结论。比如你想说一个女人很漂亮,你就不说漂亮两字,你只写她的形象出来,让别人读后感觉真是漂亮。你想骂一个人,也不骂他,但写出来让人读后感到这家伙真不是人。从那以后,我养成了记生活手记的习惯。对社会、对人生总想多看多了解。天翼同志说,观察要不带情绪,要非常客观,这样才接近真实,并能引起别人同感。当了右派以后,不敢再往本上写笔记了,怕被拿出来歪曲解释,作为抗拒改造的罪证。就每天睡觉前要把看到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重新思维一成。经过两年多,没有记录,好多事都忘了。但没有忘的恰是最值得记忆的。

我从文学讲习所出来以后,写了一篇小说《在悬崖上》(1956年秋)发表在《处女地》,接着在《文艺学习》转载。当时红了一阵,我也有点晕乎,觉得这回真是要当作家了。1957年赵丹来找我,约我把这篇小说改成电影剧本,他先付1000块钱订金。我正闷头改写剧本,全国作协叫我去开会。一共通知了四个人,我、林斤澜、刘绍棠、从维熙。作协两位领导跟我们四位年轻人谈话,内容就一个,就是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责任,响应号召参加大鸣大放。作为青年人,作

为共产党员，你们不带头谁带头？什么时候不能写作，非这几天写？什么时候不能下乡呢？非现在下乡？当时刘绍棠正准备第二天下乡去，票都买好了。只好把票退了。我也把正写的剧本停下了。按党的号召参加大鸣大放。

过了几天，到5月16日那天，报纸上登出《这是为什么》。反右正式开始了，紧接着报纸上批判刘绍棠。有一天我在南河沿碰见王蒙同志。他对我说：“邓友梅，你可要小心，你跟我大不一样，我比较谨慎。你太爱乱说，现在反右了，你要注意一点。”过了没半个月，王蒙也被揪出来了。我当然不敢多说话了。这时领导又来找我说话，说你当不当右派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现在要批评刘绍棠，这是党对你的考验。看你是什么表现？我很想借着批判刘绍棠摆脱我自己，于是准备了一个发言。我对刘绍棠“反党言行”不知道，只知道他下乡时，要让家里人蒸点馒头带着去，乡下饭难吃，到老百姓家吃饭也麻烦，所以下乡去总带着几斤馒头。我批判他时就给他上纲说：刘绍棠，你深入到农村生活，还带着馒头！你还能像农民的儿子吗？底下听众一听就鼓掌。正在鼓掌时，走上来一位领导者宣布说：“大家不要鼓掌，邓友梅也是右派。”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早被定成右派了。要是早知道就不来开会了。

从此22年没有再写东西，也没有再作写东西的准备。连日记都不写，整整20多年，除去写思想汇报和认罪书，没动过笔。

“文化大革命”中我又重新戴上了右派帽子，到1976年对我宽大了一点了，摘掉右派帽子，便让我提前退休。退休后我回到北京，这时已妻离子散，家中只有我一个人。派出

所还老让我汇报跟什么人有什么接触？又有什么运动思想？我只好每天到“陶然亭”躲着。“陶然亭”有一批划到另册的人天天一块打拳。那里有大喇叭可以天天听广播，所以没事就爱上那儿去。陈毅同志去世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从小在新四军军部，认识陈毅同志，当了右派以后，无处可诉，就给陈毅同志写了一封信。没过一个月，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陈毅同志回信并说只要有政策给右派摘帽子，第一个就给我摘。这使我非常感激。听到他去世，我心中非常难过。但又无人可倾诉，我就断断续续把回想起他的一些小事记了下来。没有题目，只是些片断。写了一些陈毅的故事。粉碎“四人帮”后，茹志鹃到北京开会，专门来看我。在给她做饭时，为了叫她能安稳地坐着，没别的事好叫她干，就找出这几篇乱写的东西给她看。谁知她看完后竟说：“你把它改成小说好不好？”我说：“改小说干什么？没有人会发表我的东西。”她说：“你改出来我拿去试一试，不说我们认识，争取先发表出来。万一发表后有人反对，就承认情况调查不细，疏忽了。”我考虑没必要叫她替我冒险，她说：“你才40岁，既没工作单位又没事可作，这怎么行？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听说大有来头。局势也许会好转……”我照她说的改了篇小说。

小说改了两篇，她认为可以发表了，给我劳动改造时的工厂写信，请保卫科替我写了一个证明“此人劳动改造期间没发现新的罪行。”既然没有新罪行，茹志鹃就给我在《上海文学》发了。起名叫《我们的军长》。没想到“四人帮”刚打倒后第一次全国小说评奖，《我们的军长》被评了个一等奖。

接着，刘绍案、从维熙、王蒙等陆续回到了北京，重新动

笔写作了。一下子引起极大轰动,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景。

这时我已经 40 多岁,好容易从被群众专政状态中解脱出来,又拿起笔来冒险值不值得?我要认真考虑,要写就得写出点模样来。若只是写两篇文章在报刊发表一下,没多大特色,就犯不上花这功夫了。写作好比跑马拉松,起跑的时候有上万人,跑到一半连 5 千人也剩不下了。到最后 5 公里坚持下来的人怕连 1% 都没有。到冲刺阶段只有三五个人了。若不跑到冲刺就不要跑。文学的冲刺是怎样冲法呢?中国人爱随大溜,而文学就决不能随大溜。王蒙写意识流被注意,我就决不能跟着写。就算跟着写的也有点模样了,人家说“邓友梅不错,写的有点像王蒙了。”我 40 多岁的人弄个像王蒙有什么劲?刘绍棠写运河我也不能跟着写运河。我必须找一找有哪些东西是他们没有而我有的。要有自己所长胜别人之所短,经过衡量比较,我终于琢磨出自己的强项。王蒙是北京清华园长大的,他父亲是大学的知识分子,他生活在知识区,对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没我了解地道。刘绍棠也是北京人,但他是通县农村人。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来北京很早,一进北京就参加做安排旧皇亲贵族生活的工作,熟识了一部分八旗子弟。小时从大人嘴里听说的在旗人都是又爱吃,又爱吹,讲求面子却没本事挣钱的一族。我们参加安排八旗子弟的工作后,发现以前对他们的看法不全面,甚至有成见。旗人平均的文化艺术修养比我们汉族人高。再进一步细了解,在琴棋书画、音乐戏剧、消闲美食文化等方面,学问很深。一个非常有文化教养的群体怎么垮到这么穷困的地步呢?原来清朝一入关,掌握了全国的政权,皇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满洲统一了中国,全